

五四时期《妇女杂志》编辑思想、体例与内容之演变

张艳玲

摘要:五四时期,《妇女杂志》是进步知识分子讨论妇女问题的园地。以该杂志中涉及妇女解放问题的相关内容为文本,从编辑学角度研究五四时期《妇女杂志》的编辑思想与特点,梳理妇女解放思想的内容变化,从而分析《妇女杂志》在传播妇女解放思想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并从性别视角出发,分别考察编者、作者和读者的性别差异。不难发现,《妇女杂志》中妇女解放思想的建构和发展是编辑、撰稿者、读者多方合力的结果,而有关妇女解放思想的传播是由男性传递给女性的。《妇女杂志》有关妇女问题的探讨,有利于妇女解放思想的形成和妇女解放道路的探索,推动了中国妇女的解放进程。

关键词:《妇女杂志》;女子问题;妇女解放思想;性别差异;性别意识

DOI: 10.13277/j.cnki.jcwu.2016.01.013

收稿日期: 2015-10-26

中图分类号: D44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3698(2016)01-0093-08

作者简介:张艳玲,女,《中华女子学院》学报编辑部编辑,主要研究方向为编辑学、妇女史。100101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中国妇女运动深入发展的重要时期。近代中国的妇女解放思想在《妇女杂志》(1915—1931年)的17卷,尤其是第5—10卷(1919—1924年,本文称为五四时期)的杂志内容中,获得了一定程度的体现。五四时期的《妇女杂志》,反映了近代中国妇女解放思想的发展历程。近年来,有针对《妇女杂志》的编辑思想进行研究,亦有以该杂志的妇女解放思想为研究对象,却缺乏从编辑学角度分析该杂志中的妇女解放思想,相关的性别研究亦不多见。本文以五四时期《妇女杂志》中有关妇女解放问题的编辑思想、策略和内容变化为研究对象,从编辑学的角度分析该时期的《妇女杂志》如何致力于传播妇女解放思想及其产生的影响,以期探讨该媒介的思想启蒙及其传播效果。并运用性别的视角分析编者、作者和读者的性别差异,以考察男女两性及其群体对妇女解放思想认识度、接受度的差别。

一、办刊宗旨改变:提倡妇女解放

1. 改革杂志编辑方针

《妇女杂志》创刊初期,以贤妻良母主义为宗旨,提倡女学和实用。从发刊辞、栏目设置等,均

以培养贤妻良母为目标,并把兴女学、加强女子教育作为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栏目上以家政、卫生、科学等为主,主要刊载以休闲性、实用性和家庭生活为主的文章,受到了女读者的欢迎,成为“闺中之最恩物,女界之良导师”。^[1]

1919年,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冲击下,报刊界掀起了讨论妇女问题的热潮。《妇女杂志》所标榜的贤妻良母主义受到了社会的质疑,被认为是“专说些叫女子当男子奴隶的话”。^[2]为适应新时代的发展,《妇女杂志》开始调整办刊宗旨。1919年12月,编辑部在第5卷第12号刊登了《本杂志今后之方针》,明确提出:“我们是抱定这稳健宗旨的,所以妇女杂志此后的眼光,一面是提倡女子解放,一面却要十二分审慎周详的去批评女子解放运动中的言论和行动。”^[3]显然,“提倡女子解放”成为杂志的新方针,表明了编者是要引起社会对妇女问题的关注,讨论关于妇女解放的新议题,同时也说明杂志的稳健风格,对妇女解放运动所持有的谨慎态度。为了实现这一宗旨,杂志办刊体例亦发生变更:“本刊为发表主张提倡改革,故有社论。为评论社会趋势女界情形,故有评论。为欲勉竭浅知,与海内留心女子问题者

商榷,故有通论。为介绍外人言论,故有译论。”^[3]“评论”、“社论”、“通论”均是对社会时事发表的政见。其中,“社论”代表了杂志的权威性话语,具有鲜明的导向性和指导性。1919年11月刊载了社论《解放的妇女与妇女的解放》,从中可见该杂志主张妇女解放的改革倾向。1920年1月《妇女杂志》新年号上,刊有佩韦的《妇女解放问题的建设方面》和沈雁冰的《读少年中国妇女号》,杂志办刊风格出现变化。

当新文化思潮席卷全国时,《妇女杂志》编者自觉立身时代前沿,开始大刀阔斧进行改革。“处在这样瞬息万变的进步时代,而所讨论研究的,又是今日最重大最急要的妇女问题,要想有美满的成绩,岂不是难如登天么?”^[4]编辑的紧迫感与责任感跃然纸上。1921年1月,商务印书馆任命具有革新精神的章锡琛接替王蕴章担任主编,自此《妇女杂志》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改革。1921年11月,该刊编辑坦言:“我们不敢把这个妇女杂志当作我们少数人发挥偏狭的议论的出版物,很愿意把她作为全国男女研究议论妇女问题的公开机关。”^[5]此后,《妇女杂志》深入探讨妇女问题,从内容到形式都大力革新。首先在内容方面,减少休闲新知等内容,注重妇女问题等探讨。杂志内涵发生了变化,正如编辑所说:“本志的主旨,固在谋妇女地位的向上,和家庭的革新”。^[6]其次在形式上,一是变换杂志体例;二是叙述由文言改为白话;三是插画采取新图;四是选译要闻,灌输新知识等。改革后的《妇女杂志》受到了读者的肯定和欢迎,其销量日渐增多,且多次加印。1921年7月,《本社特别启事》声明:“本刊自今年改良以后,荷蒙读者不弃,深加赞许,销数之多,为从来所未有。第一至第四号,近日均已售罄,而添购者仍络绎不绝。”^[7]这表明五四以后该刊对妇女问题的讨论受到了社会的普遍关注。

2. 革新办刊策略

(1) 改变杂志体例,扩展妇女解放观

为了有效地讨论妇女问题,改版后的《妇女杂志》开始在“论说”栏目介绍西方妇女解放运动,宣传国外妇女研究新思潮,以启发国人对妇女问题的思考。编辑坦言:“我国的妇女问题,方在黎明时期,实际方面的讨论,固然不可少,而先进各国学说的介绍和世界妇女状况的记述,实在也很重要。”^[8]在杂志体例上,增设了“名著”、“杂载”

两个栏目。“名著”一门主要介绍西方有关妇女问题的专著和国外经典作品,通常为翻译文章,使国内妇女大开眼界;“杂载”则介绍世界各地妇女消息,如欧美的女子解放运动、女界状况等,后来改为“妇女消息”、“妇女新消息”、“妇女要闻”、“世界妇女消息”等,介绍国外女界动向,通报世界女界信息。在《妇女杂志》调整宗旨和改变体例的背后,我们可以看到编者汲取西方新思潮的努力,以及编者的创新意识。

值得注意的是,《妇女杂志》最初主要刊登日本和欧美等国家关于妇女问题的译作,如山川菊荣、爱伦凯、倍倍尔、易卜生等人著论。而在俄国革命的胜利果实传到国内后,《妇女杂志》开始关注俄国社会主义革命,介绍苏俄妇女解放运动的文章开始增多,如7卷1号《俄罗斯革命与妇女的地位》,7卷3号《俄罗斯的母亲与儿童》,7卷5—8号《游俄日记》,7卷6号《俄国妇女的近况》,8卷10号《新俄罗斯的建设与妇女》等等。这一系列文章,有效传播了苏俄妇女解放观,极大开阔了国人的视野,为中国的妇女解放提供了思想武器。

(2) 采取多种办刊策略,宣传妇女解放主题

首先设立专号策划。专号即专刊,指杂志就社会热点或某一问题进行专题讨论,并于杂志某一期以整刊形式推出,通常由编辑策划、主动约稿得以完成。革新后的《妇女杂志》刊发了一系列有价值的专号,先后有“离婚问题号”(第8卷第4号)、“产儿限制号”(第8卷第6号)、“妇女运动号”(第9卷第1号)、“十年纪念号”(第10卷第1号)等等。专号形式新颖,对妇女问题的讨论热烈且深入,受到了读者重视。尤其是“妇女运动号”与“十年纪念号”的发行,在全社会掀起了讨论妇女问题的高潮,扩大了妇女解放的宣传阵地。可见,《妇女杂志》专号具有鲜明的策划意识,体现了编辑的主体性和创造性。

二是策划主题征文。如果说专号策划反映了编辑的重要性,那么征文则是重视读者的体现。《妇女杂志》十分重视编者和读者的交流,不仅每期都设有征文专栏,还以“征文预告”的形式呼吁读者投稿。通过对妇女问题的广泛征稿,杂志与读者之间形成了良好的互动。1921年12月,编辑从100余篇征文中选取了16篇,于7卷12号刊发了一组征文《对于妇女杂志的希望》。在这组征

文中,既有读者表达了对《妇女杂志》的喜爱和赞赏,也有读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and 希望,还有读者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其中,梅生的观点具有一定的思想和深度:“妇女解放决不是为一小部分的妇女打算的。妇女杂志也决不是第三阶级以上妇女的专有品,因此我希望她在最近的将来,把论调再变换一下,主张再彻底一些,务必切实地为全社会的妇女着想才好。”^[9]通过征文这一形式,既可遴选优质稿件,又可发现新作者,还能增加读者的兴趣。

三是发行广告宣传妇女解放思想。一方面,增强广告效应。为了强化妇女问题,《妇女杂志》经常登载广告宣传自己:“于妇女建设方面,更从切实研究,所以赞成妇女解放问题的,不可不看,不赞成妇女问题的,也不可不看。至于普通识字妇女,女校学生,要知道怎么解放、怎么建设,与本身有极重大极紧要的关系。自然更不可不看了。”^[10]该广告占有整整一个版面,且以专题“解放与建设”的形式发表,不仅突出了杂志的妇女解放主题,还明确了杂志的受众对象,指出杂志在解放妇女和女学生过程中的重要性。另一方面,杂志十分注重内容预告。主要预告次号主要内容,或推荐名家名篇,以引起读者关注和阅读兴趣。如《本志次号讨论的问题》所刊登:“‘女子参政问题’目前已成为我国迫切的问题,这回运动的胜利和失败,于我国妇女的前途,关系非常重大。本社特在次号的本志上,对于这重大的问题,加以精密的讨论,希望为运动参政的女子,作有力的声援。”^[11]这些从侧面说明了《妇女杂志》的编辑思想与妇女解放理念。

四是利用图画宣传妇女解放问题及人物。“图画”是《妇女杂志》的一个固定栏目,以刊登与女子相关的图画为主要内容。为了鼓励女子参与解放,杂志常在“图画”栏目介绍女界明星,宣传女界杰出代表及其生动事例。例如,第7卷第5号“图画”刊有妇女运动者刘清扬、郑毓秀的画像,并于文中“补白”详细介绍其生平和事迹,为国内妇女提供了良好的榜样示范作用。又如,第7卷第1号、第7卷第7号“图画”分别刊登了“北京女学生之外交运动”与“广东女子参政运动”,及时反映各地动态,广泛交流运动经验。此外,该栏还登载国外的妇女运动和妇女人物,宣传国外的妇女解放成果。由于图画形式直观,视觉效果显

著,给予读者的印象深刻,具有良好的传播效果。

3. 为扩大妇女解放阵容,注重建设作者队伍

首先,积极向“大家”约稿。约稿是编者青睐的方式,即向当时社会上的知名学者和进步知识分子约稿。通过约稿和专栏等形式,《妇女杂志》建立了稳定的作者群。这一时期,作者队伍逐渐扩大,主要有沈雁冰、周建人、李达、鲁迅、李光业、周作人、向警予、陈东原等人。需要关注的是沈雁冰,他既是《妇女杂志》的主要撰稿人,又是“社论”等栏目的专栏作者。此外,引人注目的还有周建人。他刊载了多篇有关妇女问题的论述和译作,可谓《妇女杂志》的重要撰稿人。因受读者欢迎,他由最初的投稿者变为固定撰稿者,继而成为杂志的编者。正如“编辑余录”所证实:“我们今年第一件可以报告读者的事,就是素来读者欢迎的周建人先生,已经聘请来社,担任社务。而俄国诗人爱罗先珂先生,文学家鲁迅先生及妇女问题研究者 YD 先生、李光业先生等,都允常常替本志撰译文字。这真是本社极大的荣幸。”^[12]说明该时期的编者与作者建立了稳固有效的联系,同时也体现了民国时期杂志培养作者、集聚人才的过程和特点。

其次,倡导女性作者发出声音。《妇女杂志》作为一份女性刊物,内容多与女性相关,其受众群也多为女性,而编者、撰稿者却以男性居多,不得不说是一种遗憾。尤其是五四新文化时期,知识分子们将《妇女杂志》作为女子问题的讨论园地,然而这种讨论是以男性为主、女性为辅的。在发现这一局限性后,编者有意识地进行引导:“本志的读者,自然以女界居多,但投稿者中,女子却非常之少,这是很可怪的事。我们希望有学识的妇女,肯大胆的发表意见,指导女界后进,使妇女前途能够急速发展;本志很愿替全国女有志家做一个发表言论的机关。”^[13]杂志不仅鼓励女性发表言说,还特别呼吁女性要对妇女解放问题发出声音。“妇女解放的呼声,在近来的中国,已经渐高;但是这种呼声,发于妇女自身的,实际上还要比男子所发的少。这并不是我国妇女不愿解放,实在因为大多数的妇女,知识还是很低,不容易接受新思潮的缘故。所以要说到妇女解放,非得有热心毅力的先觉,实行俄国六十年前‘到民间去’的运动不可。”^[14]在《妇女杂志》看来,妇女解放的问题在于妇女的知识水平和教育程度,因

此提出由先进知识分子引导大众的倡言。这些提倡很快得到全国各地读者的响应,女读者们纷纷来信,或参与讨论,或参加征文,掀起了妇女参与解放的热潮。正如编者所证实:“闺秀著作家,近来逐渐增多,这实在是我国女界最可乐观的一件事。”^[15]显然,《妇女杂志》在鼓励女性发声的过程中发挥了积极的引领和导向作用。

二、内容变化:探讨妇女解放思想

五四时期《妇女杂志》对妇女问题的探究,首先从女子问题的讨论开始,到妇女解放的含义确定,再到各种妇女解放思潮的探讨,乃至妇女解放途径/道路的具体探索。其中,涉及妇女解放思想方面的内容,前后有所变化和不同。有关妇女解放思想的论述,主要有中流阶级妇女解放论、第三阶级妇女解放论、第四阶级妇女解放论、妇女与劳动结合论、妇女解放与社会主义结合论等。这一时期,妇女解放思想呈全面探讨、多元发展的态势,对妇女问题的认识也由表及里、不断深入。

1. 中流阶级妇女解放论

沈雁冰是中流阶级妇女解放论的代表性人物。1920年6月,《妇女杂志》发表了沈雁冰的《怎样方能使妇女运动有实力》一文。他将社会的女子分为三个等级,一是阔太太贵小姐,二是中等诗礼人家的太太小姐,三是贫苦人家的妇女,而只有第二等妇女才能担当妇女运动的重任。他说:“这一等妇女在社会中倒也占了半数。他们不需忧生活,有机会可以受教育,娇贵的习气不曾染到,勤劳的本能不曾汨没,他们是有思想,有道德,有勇气去做事,有胆去耐苦,妇女运动必须这等妇女做了中坚,那方能有个实在的效果出来。”^[16]他指出,不仅在中国要靠第二等的女子,在西洋,也是靠无产有识阶级的女子担当妇女运动的重任,因此呼吁真正能担当妇女运动使命的人——“中流阶级有识无产的女子”快快行动起来。在这里,沈雁冰文章中提到的“第二等级的妇女”或“中流阶级有识无产的女子”,相当于后来“第四阶级妇女论”中的第三阶级妇女。

此外,李达翻译了山川菊荣的《绅士阀与妇女解放》,文中提出:“中流阶级做本位的女权论,主张把现时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照旧存在,只求在旧社会内谋部分的女权扩张,这不过是第三阶级

民主主义的一个支流罢了。”^[17]他指出了中流阶级女权论的局限性,认为中流阶级妇女解放论是不彻底的解放,其实质是资产阶级的妇女运动,相当于第三阶级妇女解放论。不难发现,李达妇女解放思想的实质,是对资产阶级女权与无产阶级人权的初步探索。

2. 第三阶级妇女解放论

1921年10月,《妇女杂志》刊发了劳秋英女士的《对于第三阶级妇女的希望》一文。她认为,第三阶级的妇女有资格进行妇女解放,因为她们衣食无忧,并受到良好的教育;至于第一、第二阶级的妇女,虽然其不必担忧生活,但她们没有受教育的机会,还把受男子束缚作为分内的事;而第四阶级的妇女,由于迫于生计,不明白妇女解放是怎么一回事。因此“第三阶级的妇女,其任务非常重大。他们一面要向男子宣战,一面要向女同胞宣传妇女主义(Feminism)”。^[18]这种观点认为,妇女解放需要依靠第三阶级的妇女,呈现出与中流阶级妇女解放观某种程度的契合。第三阶级妇女还可以带动其他阶级的妇女,从而获得全社会的妇女解放。不过,与中流阶级妇女解放论不同,这一观点没有看到明显的阶级对立倾向,确有第三阶级、第四阶级妇女彼此融合、互相团结的迹象。

3. 第四阶级妇女解放论

五四运动后,随着工人阶级的逐步登上政治舞台,一些进步的知识分子开始将广大劳动妇女当作运动的主体。1921年3月,冯飞在《妇人问题概论(续)》一文中,得出结论为“第四阶级之妇人问题”。他认为:“从前的妇人问题,尚是属于第三阶级妇人运动所要求之问题;而今日之妇人问题,乃是第四阶级——即全人类大多数妇人经济如何解决之问题。”^[19]冯飞将目光从“第三阶级”转向“第四阶级”,并将妇女运动的重任放在“第四阶级”身上,说明《妇女杂志》开始用阶级的视角来看待当时的妇女解放运动。作为一种世界观,第四阶级妇女观最先成为一些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者的共识,并逐渐成为时代的强音,成为五四妇女解放思想的重要一支。

其他作者如王警涛,声明自己赞同第四阶级论。王警涛于第8卷第1号《妇女杂志》发表了《女子经济独立问题》,认为妇女解放应着眼于第四阶级的女子,而非少数特权阶级的女子,并提

出解决经济问题是解决女子的第一步,只有女劳动者和男劳动者携手打破资本主义制度,才能实现真正的经济独立。“大家能够在经济生活上,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这种办法,在现存社会经济制度下面,是绝对做不到的。因此,现存私有财产的经济制度,便有改革的必要。”^[20]这说明,《妇女杂志》对女子问题的认识已经超越经济问题,开始与劳动问题、制度问题结合起来。

需要指出的是,阶级意识妇女观认识到社会具有不同的阶级,也认识到同一性别存在的阶级差异,却忽视了同一阶级不同性别之间存在的等级秩序,即阶级内部的性别差异没有提出来,这是将妇女解放涵盖在阶级解放之中。

4. 妇女与劳动结合论

随着俄国十月革命的宣传和妇女解放运动的日渐高涨,人们不仅关注妇女和阶级的关系,还关注妇女与劳动的关系问题。1922年11月,顾密在《妇女问题与妇女劳动问题》一文中指出,妇女运动是“中等阶级的运动或有产阶级的运动”,而妇女劳动运动是“劳动阶级或无产阶级的运动”。他还指出二者在取得成功道路上的差别:“妇女劳动运动,因为近来社会主义的倾向,在一般劳动上以非常明显的趋势,相为结合,骤然占了坚固的地盘,其运动因之大为进步。那从前市民的一般妇女运动,需要百年的时日,始得成功,而社会主义的妇女劳动运动,却不上二三年,便能与前者并驾齐驱。”^[21]这种认识将关注点从妇女问题转向妇女劳动问题,表明了妇女问题与劳动问题的结合。

此外,向警予在《妇女杂志》十年专号上发表了《今后中国妇女的国民革命运动》,提出中国的妇女问题只有结合劳动问题,才能实现妇女解放。她认为:“世界革命实现之时,即是劳动解放成功之日,妇女问题的解决,决不是单靠妇女运动所能做到的。妇女解放与劳动解放,是天造地设的伴侣。”^[22]将妇女解放与劳动解放相结合、妇女运动与国民革命运动相结合,说明该阶段的知识分子对中国的妇女问题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

5. 妇女解放与社会主义结合论

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一些进步的知识分子开始接触和了解马克思主义,并尝试运用其观点认识、分析妇女问题。在《妇女杂志》上,明确把妇女解放与社会主义联系起来的作者是早期共产

党人李达。1921年6月,他在《绅士阀与妇女解放》一文中,认识到妇女解放与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指出妇人问题的本质是妇女走出家庭,走进社会,成为社会有用的人。由此,这一时期《妇女杂志》刊文不仅将妇女问题与劳动问题结合起来,还更进一步与社会制度结合起来进行论述,这当是早期共产党人在该杂志对于妇女解放道路的初步探索。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先进知识分子认识到,彻底解决妇女问题的方法,就是结束不合理的社会制度。1921年10月,紫瑚在《日本妇女运动的新倾向》一文中,剖析了妇女解放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关系。他指出,只有推翻现在的社会制度,才能谋求妇女地位的提高。“一般妇女运动者,才觉到资本制度如果存在一天,她们的地位,一天不能增高,她们的悲惨,一天得不得救济;只有和无产阶级的男子,取一致的社会主义运动,才是根本的妇女运动。……社会主义是从资本主义的压制悲惨里救出人类的唯一能力。”^[23]说明这一阶段的知识分子已经清楚认识到,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也只有社会主义才能真正解放妇女。至此,先进知识分子对中国妇女解放道路的探索已趋明朗。

纵观《妇女杂志》,不难发现,在有关妇女解放的内容讨论中,除了男性知识分子的宏论外,还有一些“保守”和“质疑”的声音,多来自一般男性。如,奚能在第7卷第2期“读者俱乐部”发表了《妇女解放尚早论》一文,认为“中国人最喜时髦,妇女解放的提倡,也并不是迎受新潮,仍是喜时髦的一种恶习惯”。^[24]针对奚能的质疑,读者YS于第7卷第7期刊发了《提倡妇女解放是驱时髦么》一文,给予了强烈反驳:“我不敢说现在提倡妇女解放的先生们,个个都有彻底的觉悟和充分的了解;但至少可以说有一大部分因为受着新思潮的激荡,人道主义光明的影响,因而发生热烈的情感,努力为未解放的妇女请命。况且我们不必问提倡妇女解放的人是不是驱时髦;我们只要问现在妇女有没有解放的必要。如果是妇女应该解放,那么,虽然他是因为出风头而讨论妇女解放的,也值得我们参考一下。”^[25]显然,奚能和YS对妇女问题的思想认识立见高下,反映了社会对妇女解放问题的不同认知。这一争论的实质在于妇女解放到底是赶时髦还是确有必要而展开

的。通过争论,使得以YS为代表的进步思想战胜了以奚能为代表的保守言论,从而使得妇女解放的声音成为主流。其中,YS的批驳很有力量和见识。而在YS的回应中,男性居高临下的悲悯和优越感跃然纸上。

就内容而言,《妇女杂志》在妇女解放运动的主体,即谁是妇女运动的主力 and 推进者,以及妇女解放的途径方面,有不同的讨论和声音。显然,先进知识分子在实现妇女解放的目标上已达成共识,只是在妇女解放的主体问题和实现道路上有所分歧。而一般读者还停留在多大程度上接受妇女解放这一层面,说明了不同阶层对妇女解放认识度、接受度的差异。

三、编者、作者、读者之性别分析

1. 编者的性别差异与认知

《妇女杂志》的编者多为男性,除了创刊初期的胡彬夏为女性,其余皆为男性,如王蕴章、章锡琛以及杜就田等人。在《妇女杂志》看来,言论宣传对社会大众具有重要的启蒙作用:“言论的鼓吹,对于有教育而未十分觉悟的妇女,实在万不可缓。我们因此可以说:民间运动,是妇女运动的基本;而言论鼓吹,在中国今日,又是基本的基本。”^[14]另有编者提出:“我国人读书的兴味,非常薄弱,而妇女尤甚。……这固然由于教育的不发达,但出版界也不能不分任其咎。……供给妇女以新智识,希望能够成一种家庭中有趣味的读物,藉此增进妇女读书的兴味。”^[6]这充分说明,编者认识到了出版界对于引导妇女所负的使命,以及男性对于女性的启蒙责任。

编者在积极倡导各种言论的同时,还努力学习国外思潮和译著。受西方新思潮的影响,《妇女杂志》开始对自由恋爱、自由离婚、生育及性道德等问题产生兴趣,陆续创办了一系列专号。这一时期,专号主要有“离婚问题号”(第8卷第4号)、“产儿限制号”(第8卷第6号)、“妇女运动号”(第9卷第1号)、“娼妓问题号”(第9卷第3号)、“家庭革新号”(第9卷第9号)、“配偶选择号”(第9卷第11号)、“男女理解号”(第10卷第10号)以及引发争议的“新性道德号”(第11卷第1号),从爱情、婚姻和家庭等多方面探讨了女性的独立,以唤起读者对性别问题的认识和思考。这些专号从名称上,即可看出属于性别专刊,反

映了男性编者的性别意识及其追求男女平等的性别主张。这些性别论述,在变动的民国时期实属难得。编者的这些思想,“在某种程度上,也能表现男权社会中男子眼中女性的真实生活和必须接受的由男子灌输的正统思想的现实”。^{[26]6}

2. 作者的性别差异与认知

就作者而言,亦以男性居多,且存在编者兼撰稿者的情形。在发栏栏目上,有关妇女解放的文章多刊在“社论”、“论说”、“评坛”、“译论”等栏目,“名著”栏目也会刊发相关文章。作者多为男性,女性作者屈指可数。这些栏目,多与社会时事、政治相关。然而,既然名为“妇女杂志”,自然会有女性发声的空间。体现在《妇女杂志》上,女性声音出现最多的地方是“征文”栏目。此外,女性作者多出现在“家庭俱乐部”、“读者俱乐部”、“补白”、“读者文艺”等栏目。这些栏目多与生活、家庭相关,其空间狭小,话语权微弱。《妇女杂志》重要栏目男性作者居高的性别比例,加之其在发文数量上的绝对优势,与女性大多参与“征文”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体现出男性编者和撰稿者共同促使妇女觉醒的责任意识。

在发文内容上,男性有关社会革命的宏大议论,既是对妇女解放道路的指导,也是对妇女群体和个人提高的教导。佩韦在《解放的妇女与妇女的解放》中提出:“现在欲让妇女从贤妻良母里解放出来;男人要把改良社会促进文化的担子分给他们;妇女要准备精神学会本事来接这担子;这才是真解放。”“妇女的解放,是男子一面的事情;而欲使这解放成为有意思的,彻底的,真的解放,那就不能专责成男子;男子只能在旁边帮忙,提倡;却不能替妇女一手包办。”^[27]在这一观点的背后,反映的是以男性为中心的立场,认为女子是被教育者、被启蒙者,而男子是施救者、启蒙者和教育者;同时强调女子在争取解放过程中的自主性和责任,而不能坐等男子的解放。类似观点,杂志里比比皆是,不一而足。

此外,《妇女杂志》中译介国外妇女解放思潮、翻译名著的作者,几乎都是男性。努力学习西方新思潮,是五四时期知识分子为追求进步而做的有益尝试。在翻译、介绍国外思潮的过程中,男性知识分子成为认同西方思潮的接受者和传播者。而女性受教育程度低,接受新思潮慢,成为男性给予同情或施与教育的对象。这说明不同性别

的群体在接受和实践妇女解放思想的程度与能力上,存在着一定的差距。由此可以说,《妇女杂志》中的妇女解放思想,体现在性别建构上,是先男性、后女性,或者说是由男性传递给女性的。

不过,女性论者的主题虽然不够丰富,但由于性别视角的不同,其论说亦有独特的价值和意义。如王锡珍提出,“妇女解放到底是少数人还是全体妇女的解放?妇女解放是理论的还是要实践的?妇女解放是立刻完全改造家庭还是逐渐改革的?”^[28]不同于男子的宏大言论,王锡珍的思考具有现实性和批判性,其反思掷地有声,表现出对妇女实际问题的强调以及将理论付诸行动的迫切要求。

3. 读者的性别差异与认知

首先,读者的性别结构出现变化。创刊初期,《妇女杂志》致力于培养贤妻良母,这从发刊辞以及杂志广告可以看出:“识字妇女,女校学生,人人欢迎《妇女杂志》。”^[29]说明创刊初期的读者群以女学生、家庭妇女等普通妇女为主。五四新文化时期,随着妇女解放思想的传播,《妇女杂志》的读者群发生了相应变化。读者对象逐渐扩大至广大的知识分子阶层,其中包括很多男性读者。到了杂志后期,即杜就田担任主编的时期,随着征文数量的明显增多,受众群又回归女性,以女性读者、女学生为主。至此,读者群的性别建构再次发生变化。

然后,读者的思想认识发生转变,尤以女读者最为明显。在杂志编辑的重视和知识分子们的倡导下,女性读者开始承担起自我启蒙的重任。纵观《妇女杂志》,男性读者的议论性言说居多,而女性多从具体问题和自身感受出发,常在“读者俱乐部”、“征文”及“通信”等栏目发表见解。例

如,郑容孟齐女士说:“我看了许多新出版物,其中讲妇女解放的文字亦很多,惟是所讨论的人多是男子,女子一方面出来以文字讨论的人很少,求如吴弱男和邓春兰两位女士肯竭力讨论这个切身问题的人,实在很少。”^[30]从其话语,可以感受到她对女子问题的关切和对女性命运的忧虑。又如,第7卷第5号“读者俱乐部”里,女读者严谨予提出,当前的妇女解放是“贵族化的解放”,而“这种贵族化的妇女解放运动能够发展,也不过把妇女分作两个极端的阶级。这种非普遍化的运动,难道是我们所期望的吗?”^[31]作者提出了妇女解放的阶级性和普遍性问题,体现出其思想认识的深刻性。从这些女性读者的声音里,我们可以感受到女性意识的建构过程。

四、余论

《妇女杂志》中对有关妇女解放问题的探讨、妇女解放思想的宣传,起到了引领和启蒙大众的作用。五四时期的《妇女杂志》不仅致力于妇女解放的理论研究,而且积极探索妇女解放的实现道路问题。这些探索虽然没有明确指出妇女问题的出路,但是杂志中发表的妇女解放言说加快了妇女解放思潮的传播,促进了妇女解放理论的形成,使关怀对象从上层民众发展到中下层劳动妇女,对中国的妇女解放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综上所述,五四时期妇女解放思想的兴起与发展,在《妇女杂志》上多有所体现,是编辑、撰稿者和读者多方合力的结果。在《妇女杂志》的发展过程中,正是由于编者的大力倡导,撰稿者的积极言说,以及读者的热情参与,使得全社会对妇女问题的讨论和研究空前活跃,由此促进了妇女解放思想的传播和深入。

【参考文献】

- [1] 广告[J]. 妇女杂志, 1915, (1:4).
- [2] 罗家伦. 今日中国之杂志界[J]. 新潮, 1919, (1:4).
- [3] 记者. 本杂志今后之方针[J]. 妇女杂志, 1919, (5:12).
- [4] 编辑余录[J]. 妇女杂志, 1921, (7:9).
- [5] 本志第8卷革新预告[J]. 妇女杂志, 1921, (7:11).
- [6] 编辑余录[J]. 妇女杂志, 1921, (7:2).
- [7] 本社特别启事[J]. 妇女杂志, 1921, (7:6).
- [8] 编辑余录[J]. 妇女杂志, 1921, (7:1).
- [9] 梅生. 对于妇女杂志的希望[J]. 妇女杂志, 1921, (7:12).

- [10] 商务印书馆广告.解放与建设[J].妇女杂志,1920,(6:1).
- [11] 本志次号讨论的问题[J].妇女杂志,1922,(8:9).
- [12] 编辑余录[J].妇女杂志,1922,(8:2).
- [13] 编辑余录[J].妇女杂志,1921,(7:5).
- [14] 编辑余录[J].妇女杂志,1921,(7:7).
- [15] 编辑余录[J].妇女杂志,1922,(8:3).
- [16] 沈雁冰.怎样方能使妇女运动有实力[J].妇女杂志,1920,(6:6).
- [17] 李达.绅士阀与妇女解放[J].妇女杂志,1921,(7:6).
- [18] 劳秋英.对于第三阶级妇女的希望[J].妇女杂志,1921,(7:10).
- [19] 冯飞.妇人问题概论(续)[J].妇女杂志,1921,(7:3).
- [20] 王警涛.女子经济独立问题[J].妇女杂志,1922,(8:1).
- [21] 顾密.妇女问题与妇女劳动问题[J].妇女杂志,1922,(8:11).
- [22] 向警予.今后中国妇女的国民革命运动[J].妇女杂志,1924,(10:1).
- [23] 紫瑚.日本妇女运动的新倾向[J].妇女杂志,1921,(7:10).
- [24] 奚能.妇女解放尚早论[J].妇女杂志,1921,(7:2).
- [25] YS.提倡妇女解放是驱时髦么[J].妇女杂志,1921,(7:7).
- [26] 初国卿.中国近现代女性期刊述略[A].中国近现代女性期刊汇编(妇女杂志)[C].北京:线装书局,2006.
- [27] 佩韦.解放的妇女与妇女的解放[J].妇女杂志,1919,(5:11).
- [28] 王锡珍.妇女解放的我见[J].妇女杂志,1922,(8:1).
- [29] 广告[J].妇女杂志,1921,(7:11).
- [30] 郑容孟齐.妇女经济独立问题[J].妇女杂志,1920,(6:4).
- [31] 严慎予.妇女解放运动的普遍化(一首儿歌给我的教训)[J].妇女杂志,1921,(7:5).

责任编辑:蔡 锋

Evolution of Editorial Ideology, Style and Content in *The Ladies Journal* During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Period

ZHANG Yanling

Abstract: *The Ladies' Journal* was a platform for progressive intellectuals to discuss women's issues during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period. This article uses content pertaining to women's liberation in the original publication to analyze the editorial ideology and characteristics from an editorial perspective. It also summarizes the evolution of the women's liberation thoughts, analyzing the role of *The Ladies' Journal* in its publication. From a gender perspective, it also makes separate analysis on the gender differences of editors, writers and readers. Findings reveal that the women's liberation thoughts in the *Ladies Journal* was built and developed by editors, writers and readers altogether, and being transmitted from men to women. The discussion of women's issues in the Journal facilitated the forming of women's liberation thoughts and the expansion of the women's liberation roads, promoting the liberation process of Chinese women.

Key words: the Ladies' Journal; women's problem; women's liberation thought; gender difference; gender consciousness